

■ 学人著意

# 考古发掘与礼制研究

## ——读杨华先生《古礼新研》与《古礼再研》

夏麦陵

20世纪90年代我认识杨华先生时,他正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礼制问题当年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相当冷僻的领域,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揭示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和核心价值,根本不可能绕开它,尤其是考古发掘和研究。

相对于其他领域,专门从事礼制研究的学者仍然人数很少,原因很简单,难度太大。历代经学家、礼学家为之皓首穷经,清代学者更是集其大成,留给后来人的学术空间非常狭窄。要超越传统经学,无非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新方法,二是新材料。随着考古发掘的广泛开展,尤其铜器铭文和简帛材料的出土与研究,为礼制研究带来了生机。对礼制研究者来说,可谓躬逢其盛。

杨华先生就是利用简帛材料研究礼制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年,以下简称《新研》)、《古礼再研》(商务印书馆,2021年,以下简称《再研》)。除了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几种《中国文化史》著作之外,其他著作都送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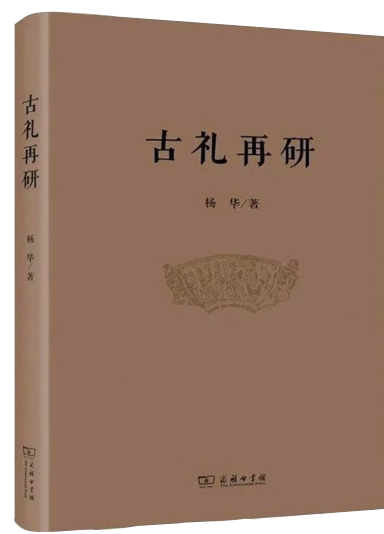
有一位学术前辈曾经直白地对我说,考古发掘人员对自己的发掘所见,非常缺乏礼制方面的认识。我自己参加过一些考古发掘,深深感觉到这一点。拜读《新研》和《再研》时,会时常联想到自己参加过的一些考古发掘,加深自己事后对这些考古发掘的认识。阅读其他学者的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时,也会有这样的联想,深深感觉到考古工作者需要加强礼制方面的文献修养。

台湾出版的《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包括《新蔡简所见楚地祭祷礼仪二则》《新蔡简祭祷礼制杂疏(四则)》《楚简中的“司”及其经学意义》《出土文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先秦血祭礼仪研究》《先秦衅礼研究》《楚地水神研究》《榘·赠·造——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宁序券券)集释》等15篇

文章,除了3篇未收入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礼新研》中,其他内容基本都在其中了。只要细读《新研》和《再研》,便很容易将二书涉及的礼制问题与自己的考古发掘相结合,并且用来指导随后的考古研究。

《新研》和《再研》的主要侧重点,是用新出的简帛材料讨论上古礼制问题。作者将简帛记载,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日书等材料与古人的生老病死过程结合考察,进而研究当时人的疾病状况、死亡过程、丧葬仪式、崇拜对象等。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他时常拿“三礼”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进行对照,对于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例如“六宗”祭祷、楚先、庙数、用血等,都得出前人未有定论的新说。关于“五祀”(即门、行、户、灶、中霤等五种家居小神),古代礼学家向来存在着两种见解:一派认为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贵族们分别祭祀七祀、五祀、三祀,具有等级差别,另一派则认为不分等级,恒祭五祀。近现代学者如章太炎等人,也对之争论不休。《新研》在《“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中,通过排列楚简、秦简中的祭祀签牌和祷祠名称,认为古人祭祀这五种小神时从来没有等级差别。这对于“恒祭五祀”的观点,可谓一锤定音。

众所周知,《仪礼》《周礼》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它们不一定完全实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也不一定完全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呈现。但是,杨华先生的《新研》和《再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将这些礼制材料与考古发掘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踵武前贤,渊源有自,是两册具有学术性、思想性与通识性的著作。下面从这两



部专著中选取几例略作说明,便可一目了然。

2005年底,山西绛县横水西周“邰伯”及夫人墓葬M1,出土了罩在棺木上绘有图案的丝织品,此即“三礼”文献上的“荒帷”。此墓下葬时间在西周中期,说明那时贵族丧葬仪式与《仪礼》的记载大体相同。这种“荒帷”在新郑及江陵的战国墓中也有所见。可见这种礼制在先秦时期相当流行,且在汉代前期的南方墓葬中仍在延续。西周时期的有铭铜器如小孟鼎、虢季子白盘、敌簋等铭文中,也有所反映。张亚初、刘雨先生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说明礼制在墓葬的使用上,至迟可上推到商代。杨华先生的《再研》中有《叶家山曾国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一文,通过考察叶家山墓地中的丰碑和桓楹、毁兵和毁器、族墓与都城、族徽与助丧这四种葬俗,指出西周早期居于南方汉水流域的曾国,其丧葬礼制与同时期其他各国并无大异,而且特别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仪礼》内容反映了西周早期的丧葬

礼制,这对于研究儒家的起源问题也具有学术价值。

宋镇豪《从花园庄东地甲骨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文物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特别研究了商代的用弓和弓法,认为商人视所获猎物有无废矢而品评优胜与否,并且在射后实行享祭先祖之礼,这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早期的甲骨文、金文记载的多是祭祀祖先的内容,最早的青铜器,也是祭祀礼仪的法器而不是生产工具。这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他国文明的地方之一(详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王国维《释礼》一文指出,繁体字“禮”字就是向神奉献祭品的象形。上半部象二玉之状,下半部则是笱豆供奉的器形。文献中的礼制活动都配有音乐,早期文明中,诗、歌、舞、乐合为一体,西周春秋时期宫廷所用与礼制相配的音乐,被称为“雅乐”,它主要是钟、鼓、磬等打击乐,后来才出现丝弦乐(详见杨华《先秦礼乐文化》)。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已指出,礼制实际上是深入平民百姓之中,由平民而流传。

杨华先生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把古文献中的礼制问题活学活用用于考古发掘中,可以说这两部专著对考古发掘所见的礼制问题大体都有涉及,这屡屡见于他的引述之中。若读他的《新研》和《再研》,自然会使得读者联想到在现场所见的考古发掘,从而加深对考古发掘的认识。这说来简单寻常,实则非经一番钻研思,是很难达到的。

20世纪以来,是先有考古发掘所遇到的现

实问题,才出现对礼制问题的重新研究,这与传统礼学中的经学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陈公柔、沈文俤二位学者的著名争论,就是这种方法的表现。《仪礼》的士丧礼、士虞礼等记录了上古时期的丧葬仪式,在目前发掘的东周墓葬中,大都得到了证明。如江陵马山战国楚墓M1所出土的女墓主,包裹尸体的方法和层数(21层),就与《仪礼》《礼记》等古文献记载大体一致。其他南方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卜筮祭祷简,记载着墓主生前祭祷神灵的时间、地点、仪式、神灵名称,这些与古文献上的礼制记载也大体吻合。埋葬棺槨中的赠书(吊丧时送礼的清单)、遣策(所有随葬物品的清单),已有大量出土的实例,与礼制记载也能大致相合。这些都在杨华先生《新研》的各篇中分别进行了讨论。

《新研》和《再研》这两册著作中的各篇文章、各个角度,其基本方法是将“三礼”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需要具备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功底,要下大力气、大功夫才能融会贯通,这并非易事。细读二书,对于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一定会有不少启发。在《古礼再研》的后记中,杨华先生自称想继续旧章,再写作《三研》《四研》之类。我们期待这《三研》《四研》早日出版!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古礼新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5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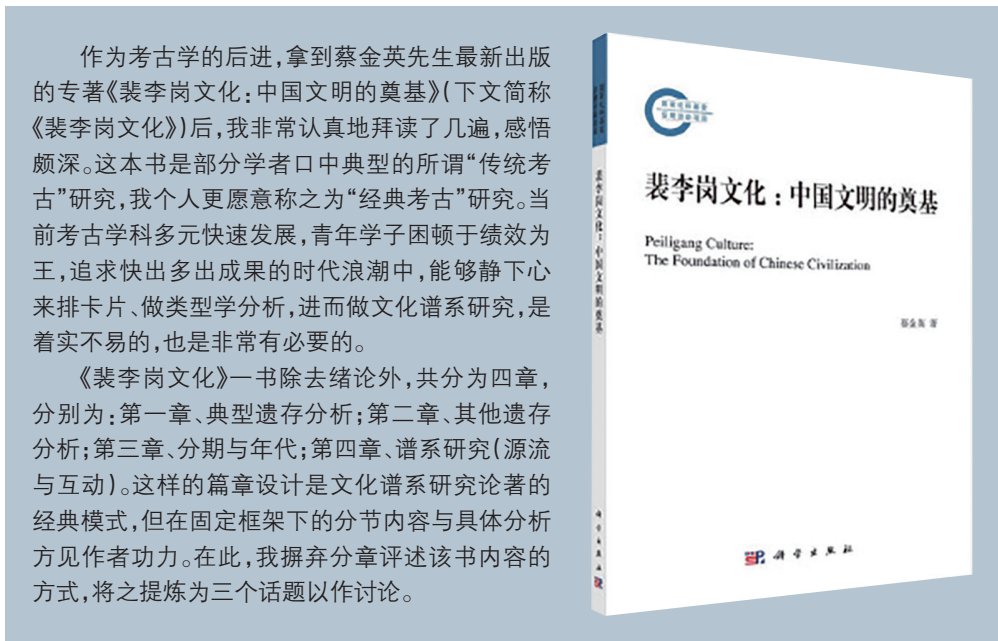
**《古礼再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128元

# 文化谱系理论的一次典型实践

## ——读《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

单思伟



### 考古学文化的界定

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界定其范围与边界,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不同维度与层面研究的基础。自夏鼐先生1959年对考古学文化作了定义与阐释,考古学文化研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也有不少学者对考古学文化作了补充论述,深化了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考古学文化研究,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容易将一些时代性普遍特征或地域性共性特征片面的作为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导致文化外延不断扩大,进而将多个文化合并成一个文化;二是未能辨析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差异或时空性差异,导致文化内涵缩小,进而将一个文化分解为多个文化;三是忽视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因素(如新发现遗址点过少,未能成片分布等),或对新类型遗址认识不足,作出的一些难以认可的新的文化命名。

在新石器时代,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具备的时空易变特质使得其成为我们面对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存进行分类、分组的最佳可操作性抓手。分类、分组的最佳对象往往是典型遗存。我们谈典型遗存时一般是指包含有较为丰富的该文化内涵,年代延续相对较长、序列较完整的一类遗存。另外,具备该文化重要阶段性或区域性特征的遗存也应属典型遗存。如果涉及文化内涵尚有争议时,最好是选择文化发生、发展核心区的遗址,且最好有两种或以上不同类型遗存叠压的遗址。前者是因为在早期时期,核心区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相对较为纯净,外围区域的遗存大多容易混杂有周邻文化因素,影响辨识;后者是因为通过上下叠压的不同类型遗存面貌对比,便于区分和界定不同文化的内涵和早晚关系。

《裴李岗文化》一书鉴于学术界对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和界定仍有争议,首先选取了几处

与功能层面的深度理解。据笔者了解,作者在《裴李岗文化》一书的前身,即其博士论文中,还在对遗址与墓葬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遗址形态与墓地布局,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场景反映的社会状况。此次在《裴李岗文化》一书没有和盘托出,颇有遗憾。

### 文化谱系理论揭示的文化变迁过程

文化谱系理论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脱胎于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可以有效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文化变迁过程。

张忠培先生认为在文化传播和迁徙的作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及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这文化因素,可通过和前后左右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类型学比较研究而被解析出来,明晰其源流。它们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多少、主次有别,地位不同,各自对对方既有吸力,又存在排斥的倾向,彼此既存在融聚力,也存在拆离的倾向,竞相发展,使考古学文化成了以主流因素为代表,又包容新旧成分的统一与矛盾的有机体。”(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裴李岗文化》一书对裴李岗文化谱系研究分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裴李岗文化的发展”“裴李岗文化的衰退转变”三部分或三个阶段,除了解析裴李岗文化的源流,还动态揭示了裴李岗文化的生成、发展、衰退或瓦解过程。比如在讨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时,并不是单一地寻找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内更早阶段的文化遗存,而是梳理了裴李岗文化形成之前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格局,分析了本地区贾湖文化的发展态势,北面磁山文化的南下过程,从而论证出是“较早的磁山文化遗存南下导致了贾湖文化向裴李岗文化的转变”。在讨论裴李岗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时,则在文化分期的尺度上系统考察了裴李岗文化向外扩张、渗透的路线、模式及影响,呈现出动态的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景,总结出“裴李岗文化的外部影响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膨胀过程,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称为中国文明的奠基。”

《裴李岗文化》一书是文化谱系理论的一次典型实践,它不但表明文化谱系理论可以较好地揭示文化变迁过程,还能阐释文化变迁过程,助力于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过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

作者:蔡金英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定价:120元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得知《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纳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右考古研究论丛”出版计划,尽管彭适凡先生著述丰厚,仍不免心生疑窦:在其已出版的论文集《江西先秦考古》《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和《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之外,竟能再汇编出一部别集?直至收到彭先生寄来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这部六百多页的文集,又令人惊愕其厚重。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近百篇,归拢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论丛”,收录考古学研究论文,既有立足赣鄱大地的民族考古、农业考古和音乐考古,也有理论视野下关于私有制起源、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第二部分为“金石丛考”,收录文物研究札记,主要为铜器、玉器和瓷器,仅铜器一项便囊括战国铜壶、唐代铜刀、宋代铜镜和明代铜牌等。第三部分为“名人史迹”,收录文章主要关于江西历史上的乡梓贤达、南昌城的历史变迁。第四部分为“学术随笔”,主要收录书序、书评及考古漫记。第五部分为“学术人生”,记述成长、求学与工作的往事,追忆了马承源、汪庆正和阎奎书等著名学者。

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近年,既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江西日报》等报刊中的学术短札,也不乏登载于《考古》《文物》等杂志的学术论文,乃至收录于《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的长篇综述。此外,还有少量未刊文稿。正是由于《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写作年代不一、篇幅长短有别、题材范围广泛,汇编工作就显得殊为不易。耄耋之年的彭适凡先生及其亲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资料室、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室搜寻、复印已刊文章。经过半年时间的整理,这些看似庞杂的文字拂去灰尘,重获温度,汇萃为《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

捧读此书,掩卷遐思,有以下读后感。

### 成长之路与学术个性

1978年,在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彭适凡先生是具体筹备者之一,也是多篇会议论文的主笔之一,后来更是成为印纹陶研究的集大成者。1989年,彭先生主持新干商代大墓的发掘,促使其研究重心转移至南方青铜器研究。由此形成了一条学术道路,以印纹陶、青铜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为切入,精研深究,探索南方地区先秦史。《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的出版,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路径。

1964年,彭先生发表处女作《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便开始关注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面貌,并对这一问题持续思考,屡有新作。从江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到先秦考古的诸多方面,均有专文讨论,在考古材料与文献、农业、民族等问题之间搭建桥梁,拼合历史。得益于对古代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对考古资料的积累与爬梳,彭先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寻找打开江西乃至南方先秦历史的“锁钥”。

### 广阔视野与独具卓识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了一批不太

# 别有耕耘

##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读后

肖宇 刘茜



为人注意而又颇有新意的文章,所涉内容广泛,且大多并非彭适凡先生为我们所熟知的研究领域。略述几例:重新审视新干古玉,辨识商代漆器玉附件;由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考释“史失其名”的秦国丞相;从铭铸“铜铉”的西汉“扁壶”出发,考证汉魏时期此类器物的名实问题;开展明代王浩八起义的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凡此种种,或慧眼识珠,或推陈出新,其中不少为彭先生退休后的新作。

### 为人之诚与治学在勤

彭适凡先生寓所自名“诚勤斋”,诚与勤亦是其为人、治学之根本。彭先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却以倍于常人的努力,成为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同时,彭先生一贯谦和、朴实,乐于提携青年、奖掖后学。《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的书序、书评及师长回忆,字里行间无不带有温情与敬意。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置身满屋书香之“诚勤斋”,翻阅彭先生精心装订的几十册书信来函,各种样式的信笺早已泛黄,但文字中透出的学术激情不减当年,其中包括夏鼐、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等先生的信札。这是通讯不便时代留下的意外记录,更是彭先生学术交往的悉心收藏。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展示了一位考古学家的学术侧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侧面,我们眼中的彭适凡先生才愈加真实、饱满。长期以来,彭先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在早已成名的研究领域之外,别有耕耘。或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别有耕耘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正是“诗外功夫”。

(作者单位: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

作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者:彭适凡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180元